

# 军阀之国

【上册】

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中国军阀影像集  
编著·骆艺黄柳青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11-1930



# 军阀之国

**Warlords of China**

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中国军阀影像集

**1911-1930**

【上册】

编著·骆艺 黄柳青

人民日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阀之国：1911～1930：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中国  
军阀影像集：全2册 / 骆艺，黄柳青编著. --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115-3481-1

I. ①军… II. ①骆… ②黄… III. ①军阀—史料—  
中国—1911～1930—图集 IV. ①K825.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0083号

书 名：军阀之国 1911-1930：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中国军阀影像集【上册】  
作 者：骆艺 黄柳青 编著

---

出版人：董 伟  
责任编辑：周海燕  
封面设计：崎峻文化  
策划制作：崎峻文化·左立

---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 65369509 65369527 65369846 65363528  
邮购热线：(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010) 65369518  
网 址：[www.peopledaily.com](http://www.peopledaily.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字 数：300千字  
印 张：19  
印 次：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

书 号：ISBN 978-7-5115-3481-1  
定 价：159.60元(全2册)

## 前言

说起北洋军阀，中国人的脑海中多能蹦出几个“如雷贯耳”的大名：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这些代表人物及他们身后庞大的北洋军阀集团，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极为浓重的一笔。在中国近代史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一段黑暗的历史。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这个具有“近代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之称的政权，从建立初始，便被北洋军阀所篡取。1912年至1928年间，中国都处于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统治之下，军阀政治充斥于社会每个角落。中央政权操纵于大军阀手中，地方势力为当地督军所掌控，这些“大帅”们活跃在社会政治生活各领域，一方面以武力维护、扩张自身地盘，另一方面操纵中央或地方政权养军扩军。而这一时期，更为典型的特征是军阀之间的混战，“大帅”之间的战事贯穿了整个北洋政府始终。以1916年袁世凯身死、北洋军阀集团分裂为界限，从1916年开始，军阀间的混战规模从小到大。据统计，1917年讨伐张勋复辟，交战双方投入兵力为5.5万人，战事波及一省；1918年第二次南北之战，交战双方总兵力为10万人，战事波及五省；1920年直皖战争，参战人数达到12万，波及三省，另有三省受影响；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22.5万人参战，四省被战火波及，另有六省受战事影响；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45万人在五个省区之间厮杀，同时另有九个省区受影响；1926年国奉战争，国民军、奉军、直军、直鲁联军、晋军在八个省区交战，五个省区被影响；1926-1928年的北伐战争，大半个中国卷入其中，战火绵延至十二个省区，另有八个被影响。初期的军阀混战，一次战争伤亡数百人，到了北洋政府统治后期，“大帅”们的战争，一次战役便有数千士兵殒命沙场。更不用说受战火波及的无辜百姓。虽然在当时西方众多媒体中，中国“大帅”们的名字和各种生活、战斗习惯充满了异国情调，这些素材常常充斥于各种媒体的头条。但是，在彼岸的中国，这些掌握着地盘上的百姓的生死大权的军阀们，给民众带来的是缴不完的税、服不完的兵役和劳役。“大帅”们顶着“讨逆”、“共和”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为地盘、政治权力，甚至是鸦片而开战时，战火波及的地区带来的却是民生凋敝，百姓无辜惨死、流离失所。

本书结合中外资料，收集近千张历史图片，以时间为脉络，通过对北洋军阀从攫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到建立北洋政府的独裁统治这段时期的各地军阀及其武装势力的展现，旨在向读者展示那一段充满了战乱、但其中又孕育着冲破黑暗的光明的历史。由于时间和篇幅有限，且才疏学浅，难免有所遗漏和失误，还请读者朋友和专家不吝批评指正。

骆艺

2015年7月于广西柳州



# Contents 目录

## 前言

|                               |     |
|-------------------------------|-----|
| 序章                            | 1   |
| 近代中国军阀概述                      | 1   |
| 主要军阀派系或地方势力(1911-1928年)       | 16  |
| 大事年表(1894-1930年)              | 39  |
| 武器装备(1911-1928年)              | 62  |
| 乱世雄杰                          | 71  |
| 晚清新军与辛亥革命                     | 85  |
| 晚清新军(1901-1911年)              | 85  |
| 辛亥革命                          | 111 |
| 北洋军阀统治的开始                     | 151 |
| 北洋政府的成立和北洋军阀势力的扩张(1912-1916年) | 151 |
| “二次革命”                        | 157 |
| 护国战争                          | 171 |
| 张勋复辟                          | 176 |
| 1916-1920年的军阀统治               | 187 |
| 1920-1924年的军阀及军阀混战            | 210 |
| 直皖战争(1920年)                   | 210 |
| 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年)                | 221 |
| 江浙战争(1924年)                   | 241 |
| 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年)                | 248 |
| 附录：军阀时代的轻武器                   | 276 |
| 参考资料                          | 300 |

# 序章

## 近代中国军阀概述

“军阀”一词，最早见诸于史册是在《新唐书·郭虔瓘传》：“郭虔瓘，齐州历城人。开元初，录军阀，迁累右卫骁将军，兼北庭都护、金山道副大总管。”这里的“军阀”指的是军功显赫的军人世家。近代中国的“军阀”，其定义多种多样，但无一不是贬义。本书中所提到的“军阀”一词，指的是北洋政府时期，充斥于中央或地方的军事统帅们，这些人拥有只效忠自己的私人军队，控制地方政权，自成派系，且实际上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甚至可以操控中央政府。这些军阀的兵员或多或少，统治区域也有大有小。一些小军阀麾下可能只有一小撮士兵且只控制几个村镇——或许称之为土匪更合适；而一些大军阀则兵员过万，统治地域横跨数省，治下百姓数以百万计。一些小军阀只有简单的轻武器如步枪、手枪等，甚至还充斥着大刀长矛等冷兵器；与之对比，大军阀往往机枪、火炮、装甲车齐全，甚至飞机都有所装备。据不完全统计，自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分裂，全国各地涌现的大小军阀多达2000人，而公认的最低数据也不会少于1300人。近代中国多如牛毛的军阀，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

近代中国的军阀，溯源可至清朝晚期。鸦片战争之后，古老的中华帝国如黄昏夕阳，内忧外患，其原有的军事结构和军事力量，对外无法抵御列强入侵；对内难以压制时起彼伏的农民起

义。1851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早已腐朽的八旗和绿营兵不堪再用，清朝统治者只能依靠地方汉族大地主、大乡绅自建的武装力量——团练来镇压起义，而这些团练武装中，又以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最为著名。

曾国藩，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人，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太平天国起义初期，他因母丧在家。咸丰三年（1853年），面对已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清廷任命湖南等十省在籍大官僚共40余人为督办团练大臣，曾国藩由此开始编练本省团练，组建起后来著名的“湘军”。

鉴于原来绿营的腐朽，曾国藩建立湘军的指导思想为：摒弃行伍出身的旧军官，实行乡土结合，建立严格的封建依附关系。曾国藩直接物色水陆各军将领，各将领再利用宗族、师生、亲友、同乡关系各去物色所属下级军官，湘军各级将领如江忠源、罗泽南、彭玉麟、曾国荃、左宗棠等都是湘中本地的读书人，层层隶属关系之下，整个湘军“兵为将有”，曾国藩层层节制各级将领。在士兵的招募上，湘军采取募兵制，主要招募湘乡人，大部分从亲朋好友、门生故旧中挑选，“以一族之父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办一方之‘匪徒’”。因此，湘军是一支极具宗族和土著色彩的封建地主武装，在其内部，军、政、财、人





■ 曾国藩 (1811-1872)



四权集于曾国藩一人，尤其是“营官自招”的成军原则和军饷自筹（湘军军饷来自纳捐和厘金）的财政原则，保证了曾国藩在湘军中的牢固统帅地位和军队归他私人 and 部属所有的性质，也正是这一点，使曾国藩成为了近代中国大大小小军阀的鼻祖，其后辈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无一不照搬此模式建军养军。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命其得意门生李鸿章返回安徽原籍操办团练，再编新军。次年二月，李鸿章以湘军营制为基础，改编安徽本省的团练，这便是“淮军”。淮军将领与湘军类似，以李鸿章为核心，乡党亲朋、父子兄弟构成军中骨干，形成一支“李家军”。

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大办洋务运动，出现了所谓的“同治中兴”。但随着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失败，旧式军队已完全不堪一用，清政府决定以西方列强军制和武器为模板，命胡燏棻于1894年底在天津小站编练中央政府掌控的新军——定武军。袁世凯借此东风，于1895年10月取代胡燏棻获取了编练新军的权力，通过“小站练兵”，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势力。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廷下决心大规模编练新军。1901年袁世凯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sup>注</sup>，全面负责编练新军，且所练新军统归其节制，这支军队便是北洋军。凭此实力，袁世凯逐渐窃据高位，而其控制下的北洋系也成为清廷中最大的实力派和军阀集团。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凭

借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窃取了革命果实，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国进入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直至1928年“东北易帜”之前，中国都处于北洋军阀集团的统治之下。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分裂为直、皖、奉三个主要派系，各派系拥军自立，割据一方。从此，中国陷入了“有军就有权”、“有枪就有势”的军阀混战阶段。军阀之间为了争权夺利而开战，在拼杀中侥幸获胜者，也往往是元气大伤，只能建立起一个虚弱的政府。他们唯恐自己的武力不足以压众，一面



■ 北洋政府时期中华民国使用的国旗：五色旗。最初来自清朝海军的将领旗。1912年1月，南京临时参议院将其确定为临时国旗，被北京政府所沿用。旗帜由红、黄、蓝、白、黑五色横条组成，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1928年，五色旗被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所取代。

寻找帝国主义作靠山，一面无节制地征兵。而战败者亦不甘心，也都做着这两件同样的事。于是，战端再起，烽火连天。这样循环往复，无休无止，政权更迭频繁。在北洋军阀集团操纵中国政局的17年中，北京政府先后更换了7位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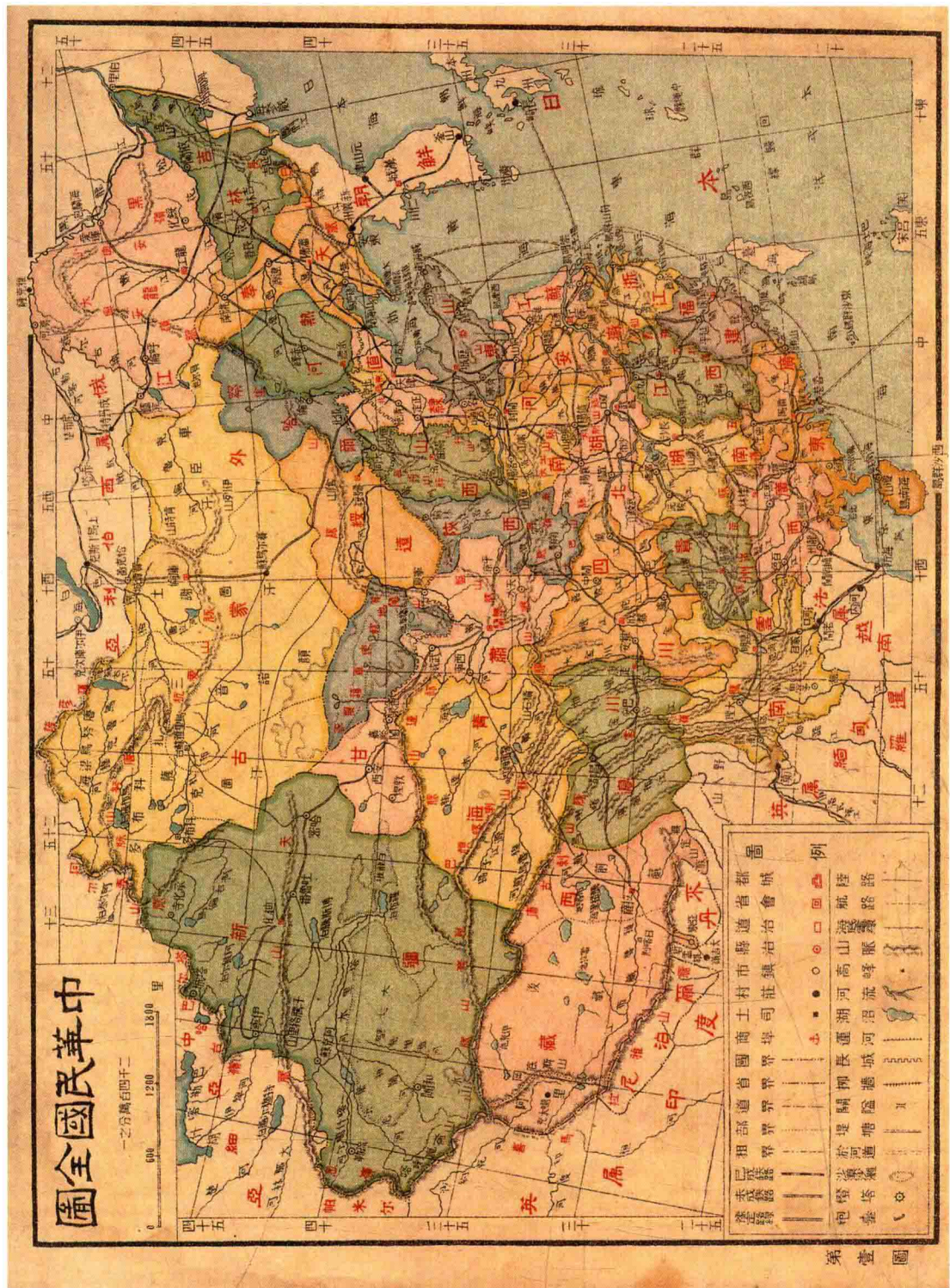
任国家元首、46届内阁，有些内阁存在时间甚至不足一个月。军阀派系间的政治斗争和混战带来了无序黑暗的政治生活和百姓流离、生灵涂炭的社会惨状。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统治充斥于社会方方面面。单从军事制度来看，当时军制的特点如下：

首先，军阀专政是当时军制最大的特征。袁世凯统治时期，限制大总统权力的责任内阁制形同虚设，军权集于袁世凯一身，军政、军令实权被袁世凯特设的“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掌握，内阁的陆军部、海军部、参谋本部无所事事。段祺瑞当政时期，也是设军务院总揽军权。张作

注：“北洋”之说最早出现在宋朝，主要指黄海、渤海朝鲜半岛附近区域，后来在清朝1791年到1821年间，以上海吴淞口为界，长江以北的均为北洋。包括江苏、山东、直隶等各口岸的地域概念。





1926年中華民國疆域地圖，此時台灣還被日本所占據。



1912-1928年中国最高政治军事领导人年表

| 职务   | 姓名  | 任职时间              |
|------|-----|-------------------|
| 总统   | 袁世凯 | 1912年3月-1916年6月   |
| 总统   | 黎元洪 | 1916年6月-1917年7月   |
| 代理总统 | 冯国璋 | 1917年7月-1918年10月  |
| 总统   | 徐世昌 | 1918年10月-1922年6月  |
| 总统   | 黎元洪 | 1922年6月-1923年6月   |
| 总统   | 曹锟  | 1923年10月-1924年11月 |
| 临时执政 | 段祺瑞 | 1924年11月-1926年4月  |
| 大元帅  | 张作霖 | 1927年6月-1928年6月   |

1916-1928年内阁总理及其内阁任期年表

| 姓名  | 任期时间                    |
|-----|-------------------------|
| 段祺瑞 | 1916年4月22日-1916年6月29日   |
| 段祺瑞 | 1916年6月29日-1917年5月22日   |
| 李经羲 | 1917年6月24日-1917年7月1日    |
| 段祺瑞 | 1917年7月4日-1917年11月22日   |
| 王士珍 | 1917年11月30日-1918年2月20日  |
| 段祺瑞 | 1918年3月23日-1918年10月10日  |
| 钱能训 | 1918年12月20日-1919年6月13日  |
| 靳云鹏 | 1919年11月5日-1920年7月2日    |
| 靳云鹏 | 1920年8月9日-1921年5月10日    |
| 靳云鹏 | 1921年5月10日-1921年12月18日  |
| 梁士诒 | 1921年12月24日-1922年8月5日   |
| 颜惠庆 | 1922年6月11日-1922年8月5日    |
| 唐绍仪 | 1922年8月5日-1922年9月19日    |
| 王宠惠 | 1922年9月19日-1922年11月29日  |
| 汪大燮 | 1922年11月29日-1922年12月11日 |
| 张绍曾 | 1923年1月4日-1923年6月6日     |
| 孙宝琦 | 1924年1月10日-1924年7月2日    |
| 颜惠庆 | 1924年9月14日-1924年10月30日  |
| 黄郛  | 1924年10月30日-1924年11月24日 |
| 段祺瑞 | 1924年11月24日-1925年12月31日 |
| 许世英 | 1925年12月26日-1926年3月4日   |
| 贾德耀 | 1926年3月4日-1926年4月20日    |
| 颜惠庆 | 1926年5月13日-1926年6月22日   |
| 顾维钧 | 1927年1月11日-1927年6月16日   |
| 潘复  | 1927年6月20日-1928年6月3日    |

■ 下图是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完成就任总统仪式后与众官员的合影。前排中握手套者即为徐世昌，左七为国务总理钱能训，左九为外交总长陆征祥，左十为曹汝霖，左十一为海军总长刘冠雄。徐世昌是北洋政府时期的第5任总统，其上台是皖直军阀政治斗争的结果。





霖控制北京政府时期，更是将陆军部、海军部、参谋本部和航空署合并为军事部，实行个人的军事独裁。

其次，混乱无序是当时军制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民国初年，在各省区设立了都督一职，为省区的最高军事长官。1914年袁世凯改之为将军，1916袁世凯死后又称为督军。这些督军都是当地驻军长官，掌握一省区军权，进而控制本地政权、经济和民生，说是本地的“土皇帝”也不为过，这也就造成了军阀拥兵自重，割地而据，祸国殃民。而且，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部分裂，各地军阀们随心所欲设立各种统率机构和军队编组，全国各地的军制开始了“百花齐放，纷乱繁杂”。割据数省的大军阀，有巡阅使、经略使、××联军总司令等名称；省级的军阀，则是督军、都统等；省下的还有镇守使。军队的编制，民国初期沿袭清末新军，新旧混杂，以师为战略单位，还有一些混成旅和独立旅，同时还有警备队、巡防营等旧军编制。袁世凯死后，各地军阀的部队，有的以师为战略单位，有的则是以旅为战略单位。还

有一些省防军之类的地方部队编制。而在军阀的混战中，“大帅”们还会根据需要编组“讨贼军”、“讨逆军”、“新建军”等等冠冕堂皇的名号。师以下的编制，更是杂乱不堪，有的一师二旅，有的一师二团或数团。每连兵额，多至百余人，少的仅数十人。北洋政府时期军制混乱之根源，在于孱弱的中央政府和割据地方的军阀这种大背景下，割据军阀为了生存发展，争夺地盘而竞相扩充军力，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建立统率机构、封赏部下和编组部队。这种现象在袁世凯死后尤为严重，各地军阀的混战激烈化，“大帅”们争先募兵拉丁扩军（仅皖、直、奉三大派系的军队，番号一时高达200个师，兵力达百万以上。其他中小军阀，兵力少则数万，多则20余万），凭军自立，割据一方，自我“加封”。

最后，半殖民地色彩浓厚也是当时军制的一大特征。近代中国军阀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军阀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二者互相勾结，军阀以列强为后台，通过其支援的军费、武器来维持、发展军队；列强通过网罗军阀，间接



■ 这是1910年校阅演习中，北洋陆军第2镇的士兵正在操纵火炮，这些士兵制服笔挺，背上背着自己的装具，从图上看，有背囊、鞋子、饭盒等，其军容也较为整齐。该镇是北洋军最先成立的6个镇之一，为袁世凯之嫡系。



掠夺中国人民。奉系、皖系都是以日本为后台，接受日本的军事援助，聘请日本军事教官进行训练。如段祺瑞的“参战军”中充斥了大量的日本教官。张作霖能够赢得第二次直奉战争，也多靠日本的军备支持。列强对“大帅”有很大影响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的军制下，兵种非常单一。局势的混乱，国家的孱弱，以至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海、空军等现代化军种难有发展，得到扩充和发展的仅限于陆军。而且，陆军发展的也多是步兵；即便是步兵，重机枪等重火器也不足。其他技术性兵种诸如炮兵等更是举步维艰。一些军阀部队虽有各种兵种番号，也是有兵缺装备，技术兵种当步兵用。同时，由于军备缺乏，很多军阀部队是兵多于枪，枪多于弹。

提到军备，这一时期的军制下的军备状况，最大特点便是频繁外购，且不说飞机大炮这些技术含量较高的军备，就是步枪、手枪这类轻武器，也基本依靠进口，只有少数军阀如张作霖、阎锡山、吴佩孚等，其治下的兵工厂可以少量仿制一些轻武器。连年的混战，也让这一时期的中国成为各国军火商倾销军火的“乐园”。

以北洋军阀为例，在袁世凯执掌北洋集团时期，从最早的1895年小站练兵开始，便外购军备武装新军，当时袁世凯曾通过德国人汉纳根购入奥地利的斯太尔-曼利夏(Steyr Mannlicher) M1895式8毫米步枪6500支，M1895式短步枪700支，左轮手枪1000支，格鲁森M1893式57毫米野炮40门。至1905年北洋六镇成军后，其装备已基本是洋械，有奥地利的曼利夏步枪、德国的毛瑟(Mauser)步枪等，火炮则有德国的克虏伯和格鲁森厂的山炮和野炮。北洋军阀集团分裂后，滋生出的大小军阀们为了扩张地盘，也掀起了扩军备战、外购军火的新高潮，更多的洋械由此涌入中国。且不说英、法、美、德、俄、日、意等列强的装备，就连瑞士、捷克、丹麦、荷兰

等欧洲小国的武器都有所涉及，种类囊括火炮、飞机、坦克、步枪、机枪、手枪、炸弹等。

除了军阀专政色彩浓厚的军制、土匪作风的士兵及其手中“万国牌”的武器，北洋政府统治给人最直观的印象，便是军阀混战了。在军阀混战中，也充斥了种种军阀统治特有的黑暗现象。

军阀混战的第一现象便是各地大大小小的战争。从袁世凯死后到“东北易帜”的12年间，北洋军阀内部为争夺中央政府的领导权而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其中最主要的战争有四场，分别是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1925-1926年的国奉战争。而南方的大小军阀们，也为了争夺地盘进行了一系列混战，如两次粤桂战争、滇桂战争、滇黔川混战、川军内战等。南北军阀间的战争也打得不可开交。护法运动时期，南北军阀以湖南、四川为主战场，湘川百姓流离失所。除了这些大规模战事，小规模战争更多，估计不下500场。有时候军阀间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的“武装冲突”，都因“太微不足道”而难见诸于报刊媒体。无论战争的规模大小，遭受兵灾的都是当地百姓。

在军阀混战时期，另一个社会现象是中国军队总人数的节节攀升。据外方统计，1916年时，中国军队总兵力约为50万人，一年后增长到70万。两年后，也就是1919年，士兵人数已达到100万，其中正规军为84万，南方各省的军队为30.4万，北方各省则有53.6万人。南方诸省中，当时受孙中山节制的军队大约有13万人，但这些军队实际上并不效忠于他，而是本地军阀；其他几个大军阀，滇军头目唐继尧，麾下约7万人马；桂系大佬陆荣廷的桂军有4.2万人，另一两广实力派岑春煊则坐拥2.9万兵马。另外的3.3万部队则归其他地方实力派所有。北方诸军阀中，皖系段祺瑞拥兵21.2万人，其余的32.4万则多属于直系冯国璋和奉系张作霖等。1922年第一次直

奉战争打响后，中国军队的总兵力增长到120万人；在1923到1924年间，兵员甚至升到150万人。

当然，兵员也并非会一味增加，随着战争或武装冲突的结束，士兵的数量有时也会因为败军被解散而一度缩减，如1912年，全国总兵员达到120万人，袁世凯有目的地裁军，裁减对象都是南方革命党人的军队，却保留自己的嫡系，至1916年时，全国50万兵员，袁世凯的部队占了一半以上。1925年，中国军队的总人数也随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结束从150万人下降到145万人。当然，这一数字随着1926年国奉战争的激化和北伐战争的爆发而飙升至约160万人，在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后，全国兵员甚至高达200多万人。然而，这只是纸面上的数字，有战斗力的、真正能上前线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例如，在1924年，直系军阀的兵力高达48万人，在这个数字中，有大约38万人是真正效忠于这一派系的；然而，在这38人里只有13万人才是真正可靠的部队。其实当时几乎所有的士兵都被视为可上一线的部队——不管有没有战斗力。但是由于不能真正为军阀所用，这48万人中有35万人往往处于被闲置的状态。

也正是因为过于追加“数量大于质量”，军阀们往往宁愿有一支5万人的二流部队，也不愿只掌握一支5000人的精锐部队。乱世之中，军队便是一切，一旦军队损失过重，军阀便失去了安身立命的资本。得到最大的物质利益和避免最小限度的战争损失，是军阀们的一致选择。在战争中，一些军阀会采用金钱收买的手段瓦解敌方阵营，以便以最小代价赢得战争。这种“银弹攻势”在古代中国并不鲜见，而在整个战乱的民国时期，更是司空见惯。1922年之前，一些军阀在战斗打响前，他们便对敌军的一些指挥官进行“银弹攻势”，让其在战斗中率部退出战斗，或者在战斗中不对自己部队开火，甚至倒戈相向。他们并不需要贿赂所有人，只要一两支部队拒绝参战，全军都会

军心动摇，那么己方便可轻易取得胜利。这种方式哪怕在北伐战争中也不罕见，在1926年的武汉战役中，北伐军也采用了“银弹攻势”，主要针对汉口和汉阳守军，守卫这两处的吴佩孚部队在被收买后，只进行了简单的抵抗便举手投降并倒戈相向了。这对北伐军攻克武昌城起了重要作用。

在民国军阀混战时期，当兵吃粮是穷人的一条谋生之路。这也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而在此现象背后，是百姓无尽的苦难。军阀部队里的普通士兵通常来自目不识丁的穷苦农民或者是生活难以为继的城市贫民。这是当时军队中士兵的两大主要来源。在穷苦农民方面，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家陶孟和在1930年6月号的《社会科学杂志》上曾发表过一篇名为《一个军队士兵的调查》的文章，以20世纪20年代晋系阎锡山在太原的警卫旅5000人中的1000人为对象，分析其社会背景。在这1000名士兵中，87.3%来自农民或无业家庭，其余是小手艺人、商人、医生、教师。而这些来自农民家庭的士兵，如果家里有耕地，且耕地面积低于27.74亩，那么这些耕地就无法养活自家，需要当兵来补贴家里。值得注意的是，这1000名士兵中，21.3%的是家中独子，大部分父母健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独子是异常宝贵的，征兵时，独子家庭宁可出一大笔钱找人替丁也不愿从军，但如此高的独子比例从军，说明这些家庭已到了极度赤贫的状态，当兵成了唯一出路。另一方面，在清末民初这个大变革的时代，传统小农经济破产，大量绝望的农民离开土地，纷纷涌入大城市寻找谋生的机会。但是，中国近代工业的稀缺，无法吸纳如此众多的农民进入工人队伍，破产农民进入大城市后，也沦为城市贫农。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30年时间里，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上海的人口数量增长了300%，与此同时，北京的人口数量也增加了一倍。伴随着人口暴增的，是失业率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城市



失业贫农涌入为增强实力而猛力扩军的军阀军营当兵，以求餐饱饭，这也是自然而然之事。

当时中国军队这种兵员构成自然也导致了兵员素质的低下，据统计，当时在一支部队中，90%的人都是文盲，其他人也多是只认识几个字的半文盲。那种为了摆脱自己“吃喝等死”的生活或者立志改变时代而从军的人只能以“凤毛麟角”来形容。正因为贫穷和愚昧，底层士兵里有很多愚昧行为。如1924年时，川军的一些士兵居然还迷信洋枪是长眼睛的，只会打死“坏人”。奉军里也是符咒和巫术流行，以此来稳定军心。张作霖便请过两个算命的“大仙”到军营里给士兵灌输冯玉祥是魔鬼转世，西北军必败的意识；甚至在士兵遭遇“诅咒”时请巫师解咒。

大多数人都是为了填饱肚子、养家糊口而扛枪。在这种从军目的下，加上军纪的普遍松弛甚至颓废，战场劫掠，过兵如过匪也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当兵的战斗时贪生怕死，对待百姓却穷凶极恶。1918年福建的北洋军在本地抢掠妇女，绑架勒索赎金，罪行罄竹难书，老百姓一度逃入山中躲避兵灾。1918—1919年，在北京政府与西南军阀组成的护法军政府的第二次南北之战中，张敬尧的北洋军第7师在主战场湖南烧杀抢掠，引起极大民愤。1920年滇川军阀混战，滇军在成都烧毁数千间民房，有计划地掠夺居民区和商业区，无数百姓无辜惨死。1922年时，一名西方记者曾采访张作霖麾下的一名骑兵，在这篇报道中，记者把这名士兵描述为“穿着军装的苦力”（a coolie in uniform）。当这名士兵被问到为什么参军时，他答道：“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战争结束后我们可以得到抢掠战利品的机会。”战后劫掠也成为军阀们鼓舞士气的手段，粤军将领黄业兴便曾这样激励心无斗志的部属：“弟兄们，再不快点前进，‘浮财’就归别人了！”

总之，对于军阀部队里的大多数士兵而言，

从军只是一种谋生手段，或者是有机会“发洋财”的渠道。有些士兵退伍后，又加入另一支军阀部队继续扛枪吃粮，或者沦为团丁、土匪，这种现象直至20世纪20年代末都非常普遍，尤其在贫瘠的山区更是司空见惯，有些士兵甚至在3—4个军阀的部队中服过役。

对于军阀来说，麾下士兵数量的多少便代表着自己实力的大小，而为了在混战中生存和发展，军阀们都痴迷于尽可能多地扩充军力，各路“大师”到处招兵买马便是当时社会一景。

军阀扩军主要有五个手段。一个是募兵，招收青年贫农和城市失业贫农当兵。其中一个方法是，地方长官奉当地军阀之命招募兵员，找几个无兵而失业的下级军官，让军官去找“募兵贩子”去募兵，“募兵贩子”由地方长官出报酬。成军后发枪发饷发装备，训练一下，便算是一支军队了。而在交通便利的大城市，也往往招外乡人当兵，上文提到的城市失业率暴增为军阀提供了大量的兵源，如陶孟和调查的太原警备旅中，只有42.3%是山西人。招外乡兵的一个好处是比较听话，最好是招长官同乡人，没有语言隔阂，又可以依靠乡土观念团结部下，叛变逃亡的事故也会相对较少，但相对的，外乡兵容易与驻地百姓引发矛盾冲突。军阀在外乡招兵的情况很多，如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便到江苏徐州招兵；孙传芳驻福建时，也到济南招兵；直系军阀、江西督军蔡成勋也在河南招过兵。冯玉祥在陕西任第16混成旅旅长时，也曾派人到冀、鲁、豫偏僻农村招收大量贫农子弟入伍。

军阀们另一个扩军的手段是实行征兵制，计丁抽兵，定额分配入伍名额，“强征入伍”，这种方式从清末新军建立时便开始实行，延续至民国。军阀们将招兵名额分配给治下的地方官后，地方官为完成配额任务，采用“拉壮丁”的方式招兵拉人，穷苦百姓是首当其冲的目标，年龄、





■ 这是北洋政府统治晚期，张作霖的安国军的士兵们。当时为了抵御节节胜利的北伐军，张作霖等军阀进行了大规模扩军，并与孙传芳、张宗昌等军阀组成安国军，联合起来对抗北伐军，但依旧无法挽回失败的命运。

身体健康条件往往被忽视，逃跑则家人被连坐惩处。当然，一些地主或家庭较富有的农民可以向地方官行贿从而躲过被“拉壮丁”的劫难。

军阀令人痛恨的一个原因是“兵匪同源”。由于军阀们想方设法地扩充实力，很多地方土匪都被他们收编入伍。而这就是军阀扩军的又一个通用手段。据何西亚《盗匪问题研究》中的估计，1916年前，中国土匪的数目达到11.4万人，1916年后更多。许多土匪就是溃散的军队，在战争中战败的军官，带着遣散费和败兵，暂时“落草为寇”，一旦整出事来，还有受“招安”的机会。1923年，山东临城发生了一起火车大劫案，因为车上有外国人且被绑架而演化为国际事件，经查这是在军阀混战中被打败的赵倜、张敬尧、张勋等的旧部为匪而做的案，如此一来，这些土匪又被“招安”重新为兵，由土匪头子孙美瑶为旅长。土匪作为地方军阀们的兵源之一，如四川北部的土匪，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中加入护国军；闽西北卢兴邦的军队、湘西周朝武的部队都是由土匪组成。黎元洪1922年在一份通电中称：“遣之则兵散为匪，招之则匪聚为兵。”虽然早在1918年9月，总统府的军事机关参陆办公处便有不准招土匪为兵的命令，但事实上几乎没有一支军阀部队中没有土匪出身的官兵，张作霖的奉军、张宗昌的鲁军、倪嗣冲的安武军、赵倜的豫军、刘镇华的镇嵩军可说是当时著名的收编土匪而成的军阀部队，更勿论那些小军阀了。1920年，张作霖便征召了大量土匪入其麾下为骑兵，并发以崭新的武器弹药，使其势力得以大肆扩张。而且，这么做还有一个好处：避免这些土匪被直系吴佩孚所拉拢，当时吴佩孚已在秘密收编奉系统治区域的土匪，以补充自己在直皖战争中的兵员损失。1916年后，陕西、福建、广西等地区的民军、自治军等非正规军，其性质与土匪无异。大量土匪的存在，造成军纪极度败坏，烧杀抢掠奸淫是

家常便饭。

当然，部队中土匪数量太多，也会是一个危及自身的“定时炸弹”，如1922年时，吴佩孚麾下由土匪改编而来的一部因不愿移防四川而闹兵变，重新上山为匪，后又再次“反水转正”。“土匪大户”张作霖部也发生过土匪哗变之事，曾有250名土匪士兵因暴动而被杀。1920年时，奉军中甚至发生了1500名土匪士兵兵变之事，兵变平息后，为了减少兵员损失，张作霖只得枪毙几个领头的土匪了事。

军阀扩军还有一个手段，即收编败军，这个手段是北洋政府时期最常见的扩军方法。在军阀混战中失败的部队和地盘，会被胜者收编，以增加自己的军力和收入。因此，一场军阀混战后，各军阀的势力对比就会发生巨大变化。1919—1924年刘镇华的镇嵩军在陕西河南的膨胀便是如此。此外，湖南赵恒锡收编张敬尧的败兵、川滇之战中川军收编滇军的败兵、1923年桂系沈鸿英收编粤军李福林的败兵都是如此。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和国民军实力的暴增，也是由于对直系败军的大量收编。哪怕是在北伐战争中，也有大批北洋军阀的败兵被收编入国民革命军中。但是，收编败军对于军阀来说，其价值并不高，因为作为失败一方，军心一时还难以融入新部队，这只能是纸上的数字，用来唬人的。另外，作为被收编的一方，军饷的发放往往不在于这支部队有多少人，而是有多少条枪，因此被收编者往往会尽力保证武器，以便可以“卖个好价钱”——这个道理和军阀收编带枪的土匪一样，哪怕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只要带有枪，那就有点价值。但是，由于军阀间的混战和相互收编，各部队的利益关系、渊源错综复杂，因此，只要“银弹攻势”够强，临阵倒戈比比皆是。

此外，军阀部队的扩充，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手段，那就是聘请外国雇佣军，但这种现象非



常少见。最有名的当属山东军阀张宗昌，他的麾下便有一支由十月革命后流亡中国的白俄士兵组成的雇佣军部队。

虽然“大帅”们不遗余力地扩军，但扩军效果往往适得其反，部队急剧扩张带来的一个影响是，原本更好的训练和齐全的装备因为士兵的暴增而难以有效分配，如前文所述的，“兵多于枪，枪多于弹”。虽然北京政府在1913年颁布了照搬自清末《新定步兵操法》的《步兵操典》，规定了主要的训练科目（战斗一般之要领、攻击、防御、追击、退却、夜战、持久战等），但在物资奇缺的情况下，士兵们往往只能进行最低水平的训练，而且并不是每一个新兵都能够配备一支步枪，部队的战斗力也自然下降。

穷人当兵吃粮，军阀养兵自重。军费自然是军阀部队的一个核心问题。但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们的军费就是一笔乱账。中央和各省的正规部队、民兵、团防，需要的军饷、给养、装备，一部分由中央和地方负担，一部分则由军队各单位就地筹集，一有战事还要征发兵差甚至抢劫，实际需要多少军费，支付多少饷银谁也不清楚，而在这些军费背后，是社会各阶层的劫难。

军阀们以各种手段敛财，搜刮民脂民膏来筹措军费，其过程和手段充满了残暴。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冯玉祥问及吴佩孚关于部队的粮饷问题，吴佩孚的回答是：“统由各本军随地筹办。”“兵站是用不着办的，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不但自己省却许多麻烦，地方上官绅也是万分欢迎的。”吴佩孚提到的“兵站”是随地筹办军费物资的机关，办事手续简单粗暴，看上了一地的粮仓、房舍或交通工具，贴上纸条，上书“××师查封”，派几个人把守，不准他人动用。然后兵站负责人与财物所有人交涉，如果查封的是当地大官僚或地主豪绅的财物，通过交涉，对方以当地权势来解除查封，兵站另寻他处筹措物资；如

果是工商业主，一般要花一笔钱来送走这些“瘟神”。层层转嫁之下，这些负担都由中小地主、农民来承受。这是军阀筹集军费的一个便利之法，也深受各阶层之痛恨。

虽然军阀的军费大部分由农民负担，其他行业如工、商、银行业等，都逃脱不了军阀的压榨勒索，军阀往往会向驻地的商会摊派2-3个月的军费，一旦被拒绝，军阀们的常用对策便是“饥兵闹事”，甚至纵容部下自由抢劫。面对这种情况，当地商会和企业或者乖乖地忍受其勒索，或者支付一大笔“送军”或“请军”费把这群匪军“礼送出境”。有时候，抢劫地方甚至也成为军阀们筹措军费的手段。1916年，山西的一个城镇便遭遇了4次纵兵抢劫之祸。

在军阀的控制下，地方的行政机构很大一个功能便是为军阀筹集军费，以下便是北洋政府时期，军阀通过地方政府筹集军费的几个主要方式，这也是其军费的主要来源：

1. 增加田赋，手段有预征赋税和附加赋税。这是普遍适用于全国的“潜规则”。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被征收的田赋已高达673项。其中，预征税最多的是四川，20世纪20年代初的安徽的预征税也征到了15年之后；附加税较高的是江苏，其附加税是正税的25倍。

2. 增加其他附加税和杂税。屠宰税、印花税……往往被附加了两三倍；并且通过加设关卡来增加厘金杂税。四川省的厘金在北洋政府时期便比清末增加了20多倍。

3. 增收鸦片税。泛滥的鸦片是军阀收入的普遍来源，军阀往往鼓励当地农民种植鸦片，若违反命令，还会征收“闲置税”。以四川为例，涪陵是四川最主要的鸦片之地，这里也是川军第21军的防区，因此鸦片税是该军最主要的收入，1930年以前，涪陵一地的鸦片税为1300万，分别是田赋的5倍和盐税的2倍。再如福建，20世纪20年